

通使窮事遂入朝。使君王宴
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歲保
與事排

蜀後主每於宮中宴。亦不命宮奴
奉送。亦不送花冠。亦不送花柳。
侍御至蜀之。誰已滿。其。上之
不悅。注之。竟生。海。神。得。後。想。注
顧之。今。不。無。此。故。書。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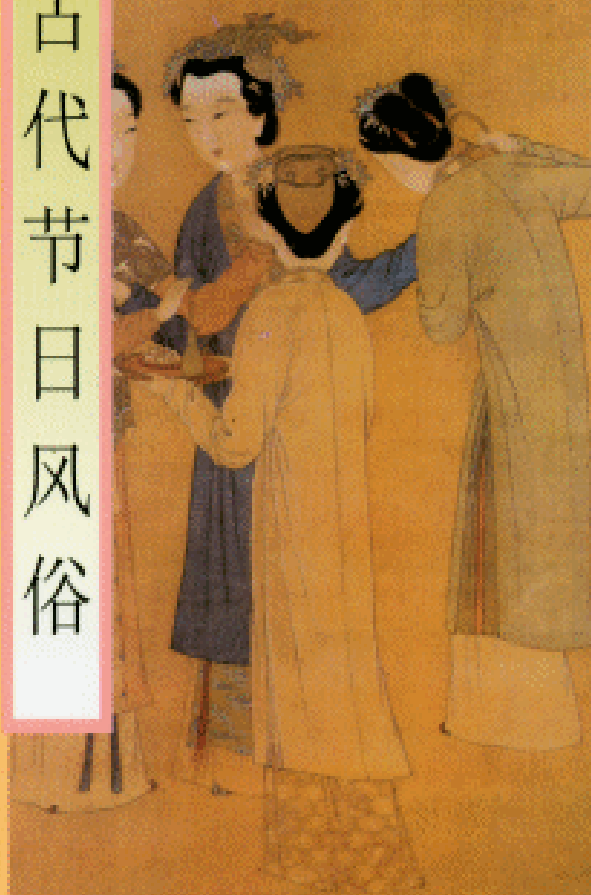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节日风俗

中国民俗文化集萃

韩养民 郭兴文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拓荒之作
多次获奖的优秀图书



再 版 前 言

《中国风俗丛书》是我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是由西北大学韩养民、葛承雍、张懋镕，《西安晚报》郭兴文等首倡并组织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全国三十余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博士生等编撰而成。先后出书三十本，约五百万字。

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反响强烈。自一九八七年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国家重要媒体发表书评百余篇，认为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大型丛书，也是二十世纪以来在全国范围首次对民俗文化作出科学性、系统性论述的大型丛书，填补空白之功不可没。

这套丛书出版后，也曾得到出版界的称誉。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三年该书三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一九九六年获陕西省教委人文优秀成果一等奖。台北文津出版社、博远出版公司竞相出版海外中文繁体字版。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台湾《联合报》及

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地媒体相继发表书评，给丛书以极高的评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也对这套丛书表示关注。

近年来，我们不时收到海内外读者电话，他们殷切希望出版社修订丛书，重新再版。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社委托丛书原主编韩养民教授，对丛书进行精选、修订、统一体例工作之后再版，以飨读者。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编者献辞

滋润着祖国辽阔土地的黄河、长江，像母亲的乳汁，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千百年来华夏各民族人民，在我们这个光荣而又古老的国度里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在发展生产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凝聚着历代人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激励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代表着中华民族文明教化的水平。那十五的花灯、端午的粽子，那轻歌曼舞的霓裳羽衣、弹筝搏缶的下里巴人，那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的山水园林，那争奇斗妍的文人书画、繁花似锦的民间艺术，更有那尊老爱幼的美德、谦逊辞让的风范、舍身取义的习尚、精忠报国的传统……它们像锦上之花，使中国历史的画卷显得那样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又像色彩斑斓的彩带，把我们民族的生活装点得绚丽多姿、格外美好。它使我们骄傲自豪，鼓舞我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

但是，在我国传统风俗中也存在着另一面。那尊卑有等的礼仪规定、男女有别的清规戒律，那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死做夫鬼的守节殉身，

那崇神拜鬼的宗教迷信、铺张侈糜的婚冠丧葬……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习也是中国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压抑着人性，磨灭着民族的锐气，麻醉着人们的心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成为中国保守、落后的根源之一，使我们深恶痛绝，必须彻底摒除而后快。

历史是割不断的。许多古老的习俗仍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作用。当中国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代风俗中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风俗丛书》，向国内外广大读者系统、全面地介绍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风俗的形成、内容与特征。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帮助读者透过中国各民族纷繁多样的风俗形式，把握我们民族的心理特征，从而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

《中国风俗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导 论	(员)
员援神秘的原始崇拜与禁忌	(圆)
圆援节俗发展与演变	(猿)
猿援节俗的特点	(源)
二、除夕与元旦	(源)
员援年节的起源与定型	(源)
圆援年节的发展与变异	(缘)
猿援宋元明清时代的年节	(苑)
三、元宵节	(苑)
员援元宵节探源	(苑)
圆援祭门户、祀蚕神	(苑)
猿援元宵节的盛行	(苑)
四、清明节	(苑)
员援清明节的扫墓与禁火	(苑)
圆援清明节俗与娱乐活动	(苑)

猿援清明习俗的传承	(猿怨)
五、端午节	(猿怨)
猿援探幽溯源	(猿怨)
圆援纪念志士，避恶求祥	(猿缘)
猿援娱乐习俗日新	(猿员)
源援龙舟竞渡，卫生保健	(圆四)
六、七夕节	(圆四)
猿援历史传说	(圆四)
圆援七夕节俗的形成	(圆源)
猿援七夕风俗的兴衰	(圆怨)
七、中秋节	(圆缘)
猿援月宫之谜	(圆四)
圆援赏月、拜月	(圆源)
猿援赏桂、观潮、吃月饼	(圆元)
八、重阳节	(圆四)
猿援萌芽与定型	(圆四)
圆援登高、饮酒、赋诗、射箭	(圆四)
猿援赏菊、菊花会、食糕	(圆员)

一、导 论

节日风俗的形成过程是一种历史的积淀过程，许多现代流行的节日风俗活动可以说是古代人民生活生活的活化石。然而，千百年的历史灰尘遮住了这块活化石的本来面目，因此，人们在生活中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节日风俗的起源、发展、演变的历史，不像政治、军事历史那样大起大落、风云变幻，也不像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由石斧陶罐、青铜冶炼到蒸汽机、电气化那样标志明显。它是一个潜移默化、节奏缓慢的发展过程，渗入历代人们生活方式的细微末节，表现出一定时代人民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一种特有的社会风尚，节日风俗内容也就会相应出现发展和变异。从总的趋势来看，节日风俗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随着历史的进程与时间的推移，节日风俗的发展和演变留下了一条显明的轨迹。

员援神秘的原始崇拜与禁忌

探讨中国节日风俗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节日风俗起源问题。我国各民族有多种多样的传统节日，一年四季不同的节日又各有不同的风俗活动，每个节日都有它的来历及独特的发展历程。传统的民族节日除个别节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节日外，大部分都起源于先秦时代，有的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那么节日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节日产生、发展的过程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节日的产生与天文、历法、数学有密切关系。在“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形成节日，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公理。关于古代天文历法知识，我们从文献上至少可追溯到《夏小正》与《尚书》。《夏小正》虽然难以确定为夏代之作，但它也可能反映夏代的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其中有一年各月晨昏北斗斗柄的指向及若干恒星的见、伏或中天的记载，而且把这些天象同相应的物候糅合在一起，构成天文历与物候历的结合体。在《尚书·尧典》中已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四仲中星”岁时划分

记载。此“四仲”正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节气。这四个节气的确定至迟在商末周初，到战国时，我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基本齐备，每隔十五天设一节气，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等份，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纪时方法来讲，夏代已出现天干纪日法，商代又配以十二地支，成为六十干支纪时表。在殷墟出土武王时的一块牛胛骨上就刻着完整的六十甲子。到周代又发明用圭表测影计时，进一步确定了冬至（一年中正午日影最长时）与夏至（一年中正午回影最短之时）。并且，在周代还定出了“朔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所以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历日的确定为节日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比如“冬至”作为节日首先要确定“冬至”这个节气；元旦的定型的前提首先是正月“朔日”的确定；有人认为“端午”起源与夏至有密切关系，那么夏至的确定也为端午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但是，节日并非历日，也非节气。历日确定仅仅只为节日产生提供了必备前提。节日必须有一定的风俗活动。从最早的风俗活动来看，原始崇拜、迷信与禁忌才是节日产生的最早渊源。原始崇拜中图腾崇拜占据重要地位，我们胼手胝足的先民们，在靠采集野生植物和猎取动物求生存

时，动植物成了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原始氏族把动物尊奉为神明来崇拜，在我国最典型、最普遍的图腾崇拜可以说是龙崇拜。“龙”是我国古代人民幻想出的一种动物。《说文解字》解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商周青铜器上有大量龙的图案。在《易经·乾卦》中有“飞龙在天”、“或跃在渊”、“见龙在田”等记载。作为“鳞虫之长”的龙既是祥瑞动物，又是掌管雨水的神灵。对于一个原始的农业国度，龙的神奇作用太大了，因此古代不乏祭龙的记载。如《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这里就是把龙作为雨神来祭祀的。再如《山海经》中描述“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而烛龙“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古代帝王自称“真龙天子”，或人龙交合的产物，并且认为龙与天帝有密切联系，因此要“交龙为旂”（《周礼·春官》）、“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礼记·郊特牲》），以龙旂来象征龙，给人们带来吉祥。龙图腾崇拜对中华民族影响极为深远，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正因如此，江浙一带的古越民族每年端午有祭祀龙图腾的“龙舟竞渡”活动，闻一多先生认为这种龙图腾崇拜是端午风俗形成的渊源。而二月二龙抬头节则与龙在“春分而登天”的观念有直接关系。原始崇拜中有日月星辰崇拜。

一九六〇年在山东黄县陵阳河出土了四件陶尊，其中两件陶尊上分别刻有“𠄎”、“𠄎”两个图案，这两个图案描绘的是太阳、云气和山冈。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最早的“旦”字。这些陶尊距今已有四千五百多年，是先民们用来祭祀日月、祈保丰收的祭器。日月崇拜在世界各国都比较普遍，南美洲土著民族以为月亮的柔和光线带来凉爽和露水，滋润人畜，促进植物生长，因此祭月。以色列人要举烽火迎接新月初升。古埃及、希腊、印度都有月崇拜。我国古代也曾盛行日月崇拜。在《山海经》、《楚辞》中都有月宫神话的记载。而《礼记》还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种原始的祭月、拜月正是中秋节赏月风俗的源头。星辰崇拜在《史记·天官书》中反映最为突出，一部《天官书》使满天的璀璨星斗各有所主、各有所司。《尔雅·释天》“祭星日布”，也可看出古代星辰崇拜的风俗。但是在满天星辰中，与劳动人民关系最亲密的是牛郎、织女星。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反映到星辰上，相反星辰又主宰了人间命运。如《史记·正义》解释织三星：“主果蓏丝帛珍宝。”而《史记正义》引古代占星术的解释就更神秘离奇，认为王者人主对神明至敬至孝，便三星俱明，否则三星光芒暗而微，天下女工皆废。如果织女三星中的大星光“怒而角”，那么就会“布帛涌贵”，看不见就会起

兵灾。可见织女星与人民生活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最早的对织女星的崇拜与祭祀正是七夕拜星、乞巧风俗的上源之一。

中国古代原始崇拜中还有天地崇拜。我国以农立国，人们赖以维持生命者是土地，是谷类，没有土地，则谷类无所寄以生长，所以劳动人民与土地分不开，更重视土地神崇拜与祭祀。古代称祭土地为“社祀”，《说文解字》云：“社，地主也。”《礼记·郊特牲》：“社祭土。”我国古代这种土地崇拜及祭祀源远流长，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社所从来，尚矣。”土地崇拜早在夏商时期已存在。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祭祀“亳土”的卜辞。不过早期的土地崇拜是自然崇拜，商代以后便出现拟人化的土地神。西周以后土地神也分了等级，人们把土地称为社神或社主，有时把祭土地神的地方也称社。祭社的方法也有多种，一种是“瘞埋于泰折”（《礼记·祭法》）。孔颖达注《礼记·郊特牲》说：“地示在下，非瘞理不足以达之。”二是血祭，《周礼·大宗伯》就记载：“以血祭社稷。”当然以上两种为帝王祭社法。更为普遍的是封土设坛而祭或树木而祭。《风俗通义·祀典》中说：“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社而祀之，报功也。”在《墨子·明鬼》中提到“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菽社。”关于祭社的树木选择

说法也很多，如《论语·八佾》就记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回答说：“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在周代认为社神名后土，是共工之子。在《左传》与《礼记》中均持此说。尽管其说千差万别，祭法各地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地神是由原始的土地崇拜发展演变而来。而我国古代普遍存在着土地崇拜，在民间祭社活动尤为盛行，因此《国语·鲁语上》中有“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的记载。《淮南子·精神训》中说：“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为乐也。”说明当时祭社形成十分广泛的民俗活动，即使穷乡僻野也是如此。由于这种原始土地崇拜风俗，后来就逐步形成了几个相关的节日。一是“社日”，分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和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春社向土地神祈祷请求赐与丰收，而秋社则是对土地获得丰收的酬报，称做“报功”。《荆楚岁时纪》云：“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飧其胙。”“社日”在古代是十分受重视的节日，如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唐王驾《社日》诗云：“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二是“立春”的行春之仪，高承《事物纪原》就有“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之说，实质也是祭土地神形式之一。三是二月二的龙抬

头节也渗入祭土地神的风俗，俗传是土地公公的生日。

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重伦理，上古时代已开祖先崇拜之端，到商周时代祖宗崇拜之风日盛。上古的祖先崇拜，到春秋战国时代演变出儒家的孝道，提倡“事死如生”。然而祖宗崇拜的风俗及礼俗也对节日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寒食、清明的祭奠风俗直接来源于祖宗崇拜，而腊日的形成也直接源于祖宗崇拜。如《风俗通·祀典》云：“礼传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以兽祭祀其先祖也。”不仅腊月腊八之节日来源于祖宗崇拜，而且年节、中秋、冬至等节日的祭祖风俗无一不导源于此。

但是，节日风俗的来源并不全是原始崇拜的产物，不少节日的风俗内容都是来自古代禁忌与神鬼迷信。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神鬼迷信”与巫术有很大关系，最突出的表现是巫术对自然界的征服，而不像后来的神鬼迷信那样“尊神事鬼”，向自然神秘现象以及子虚乌有的神鬼屈服。

在上古人的面前，世界是错综复杂而又严峻无情的，他们只能凭借着感性的、质朴的思维方式，去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把握自然的某些表象，当其对大自然的许多奥秘寻找不出答案时，就产生了许多禁忌。和岁时相关的禁忌与后来节

日的形成不无关系。如寒食节禁火就是渊源于古代禁火俗，《周礼·秋官司寇司烜氏》就记载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倘若追溯禁火习俗，与古代原始火崇拜有关。经过一冬的干燥，林木容易引起火灾，加之春季又多雷雨，更易引起失火。古人对此自然火灾缺乏科学认识，就提倡禁火冷食，后来被统治阶级纳入礼仪中，又形成礼俗固定下来。又如每年春季，正是瘟疫与流行感冒易发的季节，因此古代人要在这个时候袪禳防疫，这就是上巳节（后来固定为三月三日）的来历。所以最早对上巳节的记载均与巫术袪禳相关。如《风俗通祀典》云：“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袪除与浴。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在古代尽管对流行病缺乏必要的研究，但是，在发病季节，已认识到应讲究清洁、注意健康卫生还是值得称道的。因此，袪禳讲究盥洁，这同南方傣族泼水节颇有类似之处，只不过加上了巫术迷信色彩而已。与此相似的是五月，正是炎热酷暑将临之时，也正是流行病、瘟疫疫病将发之际，用现代医学观念来看，乙型脑炎与脑脊髓炎此时发病率也最高，古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月。五月五日更是恶月恶日，连生的儿子都不吉利，从而导致了端午节一系列风俗的形成。同样，九月九日重阳，主要远游登高，以避疫病，其原因也是如此。总之，古代节

日都有所禁忌，当我们对这些现象进行探索时就会发现，古代大部分节日都是单日，尤其是单月单日，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中国人认为双月双日、成双成对为吉利，为何节日大多是单月单日呢？如果仔细考究，这些所谓节日并不像后世演化的那么欢天喜地，称“佳节良辰”而都是些极不吉利的日子，各有所禁忌，非“凶”即“恶”。正是这些恶月、恶日，导致了节俗的形成。

古代神鬼迷信与巫术紧密结合，许多神鬼迷信观念在节日风俗产生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古代鬼一是指人死后精灵不灭，为鬼魂；二是指万物形成的精灵，这些鬼能危害于人。王充《论衡·订鬼篇》中对各种各样的鬼作了详尽的论述。古代人由于对鬼的畏惧，便要借助神的威力来驱鬼。与节日关系比较紧密的就是门神。在《礼记·丧大记》郑玄注中就有“礼门神”之说，而《荆楚岁时记》又将神荼、郁垒确定为年节门神。考其神荼、郁垒的神话传说在《山海经》中已有记载，可见由来已久。以门神驱鬼本身是一种巫术形式。除过神外，桃木也被古人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而用于驱鬼、巫术中。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楚人要襄公亲自给死人送襚衣，这对襄公来说是有失君臣之礼受辱之事。但是襄公听